

政治生态学研究述评

李永祥

政治生态学诞生于对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批判。经过长期的发展,政治生态学目前已经成为生态/环境人类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解释框架之一,研究视野不仅涵盖了以往的土地使用、森林管理、生计变迁、水权、畜牧业集体养殖等问题,而且包含着当代的灾害、气候变化、转基因、城市化等问题。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不断探索以及认知方式的不断完善,政治生态学走向了后结构主义的新的研究范式。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反思,对于全球环境变迁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问题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政治生态学 生态/环境人类学 文化生态学 环境变迁

作者李永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昆明市,邮编 650091。

一、问题的提出

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中有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自1957年首次提出来之后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①基于对文化生态学的批判,经过长期的发展,政治生态学目前已经成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解释框架之一。无论是以往的土地使用、森林管理、生计变迁、水权、畜牧业集体养殖等问题,还是当代的灾害、气候变化、转基因、国土安全、城市化等问题,都在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视野之内。一些学者认为,政治生态学不是一种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实践共同体,所代表的是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中强调政治经济因素,特别是强调权力分配及其后果的生态学。^②事实上,政治生态学已经成为多种研究范式和观点聚集的跨学科领域。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不断探索以及认知方式的不断完善,政治生态学的环境认知走向了更高的层次,如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生态本体论等,展现出后结构主义的新的研究范式。

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反思丰富了生态/环境人类学理论,对于全球环境变迁(如灾害频发、气候变化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问题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

① 参见 Bertrand De Jouvenel,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Political Ecolog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13, No. 8, 1957.

② 参见 Paul Robbins, *Political Ecolog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4, p. 5.

值。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①人类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上的需求,但这还不够,还有生态产品方面的需求。如果只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没有适宜的生态环境,人的生活质量也不会提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同等重要。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人民福祉、民族未来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国内学界对政治生态学已有一些评述性的研讨。如李秀英对埃斯科巴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②罗意关注了政治生态学作为西方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③蔡华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政治生态学展开述评,^④温晓春、韩欲立从哲学层面对政治生态学进行讨论。^⑤上述情况说明,国内学界对于政治生态学的发展,特别是从文化生态学到后结构主义的政治生态学的转换尚未给予充分重视。本文以政治生态学对于文化生态学的批评为基础,对政治生态学的范式转换、研究视野、发展趋向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问题研究提供借鉴。

二、诞生于文化生态学批判中的政治生态学

20世纪50年代是人类学在生态和环境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年代。以斯图尔德(J. Steward)和怀特(L. White)为代表的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论在人类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直接导致了60年代生态人类学多种理论和研究取向的产生,如新功能主义、政治生态学、历史生态学、认知生态学等。这些理论和解释框架对后来的生态人类学和社会人文科学中的生态环境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生态环境研究的很多理论取向和视野建立在学术批判和反思基础上,政治生态学就是对文化生态学、新进化论、新功能主义等研究中忽视政治经济的情况而产生的新的研究取向和解释框架,它的产生改变了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中不重视政治经济的状况,实现了政治生态学意义的转向。

政治生态学伴随着对文化生态学的批判而产生。莫哈特(C. Morehart)、密尔霍瑟(J. Millhauser)等人指出,政治生态学用政治经济学的工具来进行生态和环境研究,文化生态学的那种以单一社区或者村寨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研究,包括将文化视为适应自然的唯一方法和手段的做法,在政治生态学中受到了批判和反思。^⑥文化生态学无法解释生态和环境变迁,特别是在面对当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生态环境变迁状况时,生态环境研究需要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② 参见李秀英:《人类学家埃斯科巴的政治生态学理论新视觉》,《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③ 参见罗意:《政治生态学:当代欧美生态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④ 参见蔡华杰:《国外政治生态学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⑤ 参见温晓春、韩欲立:《政治生态学:生态学内容和方法上的考察》,《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⑥ 参见 Christopher T. Morehart, John K. Millhauser, and Santiago Juarez, “Archaeologies of Political Ecology: Genealogies, Problems, and Orientations,” *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29, No. 1, 2018.

新的视野和范式,政治生态学由此诞生和发展。^① 政治生态学产生之时形成了两种主要倾向:第一种是植根于文化生态学基础上的环境变化研究,另一种则是具有后结构主义倾向的所谓“新政治生态学”。^② 前者是政治生态学的产生基础,后者则是政治生态学走向深入的标志。

有些学者将政治生态学的思想源头追溯到人类学家对政治组织的兴趣,如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的《努尔人》以及利奇(E. R. Leach)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③ 在《努尔人》中,普里查德讨论的主题是政治制度,但他认为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无法解释努尔人的政治制度。因此,在普里查德看来,努尔人的政治制度与生态环境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④ 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中,利奇指出长期不稳定的政治组织与生态环境的约束有关系。^⑤

最早使用“政治生态学”术语的是法国经济学和政治哲学家贝特兰德·德·尤夫尼尔(Bertrand De Jouvenel)。1957年,他发表了《从政治经济到政治生态学》(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Political Ecology)的文章。^⑥ 后来,美国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探讨了阿尔卑斯山地区所有权与政治生态之间的关系,认为复杂社会中的财产关系不仅是局部或区域生态过程的结果,还是利用法律模式维持或调整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各种力量斗争的战场。^⑦ 尤夫尼尔和沃尔夫的研究在政治生态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筚路蓝缕的重要意义,他们所使用的“政治生态学”术语受到学界的一致追从。

政治生态学的发展有两大理论推动力,即政治经济学和生态分析,前者坚持把权力分配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后者则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广泛联系起来。^⑧ 政治生态学和政治经济学在环境研究问题上有交叉,也有不同的侧重:政治经济学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关注的是由技术导致的环境破坏;政治生态学也批判资本主义,也关注这些环境破坏,但它更为关注不同性别、种族和族群与生态之间的关系。^⑨

政治生态学的解释框架具有多元性特点,如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世界系统理论、土地学、产权理论以及其他有关理论都对这一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⑩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政治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本质上讲,政治生态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它的发展和解释框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同皮特(R. Peet)和瓦特斯(M.

① 参见 Paul Robbins, *Political Ecolog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4, p. 14。

② 参见 Peter A. Walker, “Political Ecology: Where Is the Ecolog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9, No. 1, 2005。

③ 参见 Yancey Orr, J. Stephen Lansing, and Michael R. Dove,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Systemic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44, 2015。

④ 参见[英]埃文斯-普里查德著,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⑤ 参见[英]埃德曼·R·利奇著,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种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⑥ 参见 Bertrand De Jouvenel,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Political Ecolog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13, No. 8, 1957。

⑦ 参见 Eric Wolf,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Ecology,”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45, 1972。

⑧ 参见 James B. Greenberg and Thomas K. Park, “Political Ec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 Vol. 1, 1994。

⑨ 参见 Aletta Biersack, “Introduction: From the ‘New Ecology’ to the New Ecolog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1, No. 1, 1999。

⑩ 参见 James McCarthy, “First World Political Ecology: Lessons from the Wise Use Movem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 34, No. 7, 2002。

Watts)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生态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它的灵感不是来自孤立的农村社区,而是来自资本主义转型阵痛中的复杂的农民和农业社会。^① 政治生态学因此超越了以文化为适应方式的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它将政治经济直接融入分析之中。其理论动力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更是直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危机四伏的观点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态学者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充满危机。^② 此外,唯物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社会活动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后结构主义人类学者的加入,促进了不同的聚焦点和观点的形成,也催生了多种研究主题,如资本主义发展对环境的影响,环境保护和管理的社会政治影响,新自然(物种、景观和生态系统)产生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等。^③ 正是因为政治生态学的发展走向更加多元和以政治经济为中心的方向,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它走向了“唯政治经济论”的分析方法,出现了所谓“只见政治,不见生态”^④的状况。这样的批判,是对政治生态学从批判文化生态学“无政治经济论”走向“唯政治经济论”的纠正,这也是政治生态学走向后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反思和批判使政治生态学研究领域逐步走向成熟。

政治生态学与生态/环境人类学中的一些理论学派和取向(如历史生态学、景观生态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生态学与历史生态学被认为是相同的或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政治生态学具有一个与历史生态学相关的特征,即以一种更开明的方式来重建过去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景观,在此种意义上讲,政治生态学可能是历史生态学的同义词。^⑤ 景观,作为一种自然和人工的地理综合特征,在历史生态学、景观生态学、政治生态学中都有重要意义。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土地覆盖模式、成因及其影响;历史生态学强调历史上不同时期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但它不像政治生态学那样强调环境变迁中的政治经济因素,相反,它非常强调文化在景观中的意义;政治生态学中有很多学者也注重景观研究,特别是城市景观研究,强调景观变迁中的政治经济因素。琼森(Matthew Johnson)对古城堡的景观研究使用了政治生态学的原则和方法。在琼森看来,城堡是不同阶级、地位和性别的人工作的地方,其作用是控制、促进和引导人口流动,体现了政治生态学的核心要素。^⑥ 也有学者对当代城市进行政治生态学研究,如海泥恩(Nik Heynen)所作的有关城市饥饿的政治生态学研究,^⑦说明了政治生态学对于城市景观的重视。在当代城市研究中,与历史生态学相比较,政治生态学更重视城市中的政治

① 参见 Richard Peet and Michael Watts, "Liberation Ecology: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 in an Age of Market Triumphalism," in Richard Peet and Michael Watts, eds., *Liberation Ecologie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v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1-45.

② 参见 James O'Conno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1, No. 1, 1988.

③ 参见 Richard Peet, Paul Robbins, and Michael Watts, "Global Nature," in Peet, Richard, Paul Robbins, and Michael Watts, eds., *Global Political Ec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1-48.

④ 参见 Andrew P. Vayda and Bradley Walters, "Against Political Ecology," *Human Ecology*, Vol. 27, No. 1, 1999.

⑤ 参见 William Balee, "The Research Program of Historical Ec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5, 2006.

⑥ 参见 Matthew Johnson,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Medieval Castle," *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29, 2018.

⑦ 参见 Nik Heynen, "Justice of Eating in the City: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Urban Hunger," in Nik Heynen, Maria Kaika, and Eric Swyngedouw eds., *In the Nature of Citie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24-136.

经济问题与城市环境的关系。

事实上,政治生态学也借鉴了生态/环境人类学中如认知生态学、符号或象征生态学、行为生态学等理论取向的很多见解。认知生态学聚焦在人类社会对生态和环境的认知基础之上:以原住民社会对环境的观察为基础,通过观察和实践获得经验,形成了所谓的传统知识,包括民族植物学、民间生物学等。由此说明,人类对环境的观察以文化为基础,文化不仅影响着观察,观察的结果也影响着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应对方式。^① 符号或象征生态学通过对魔法、生育仪式、图腾崇拜、宇宙学、神话学等的研究,将自然的文化变量在不同的地方以强有力的方式呈现出来。^② 行为生态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的进化生态学研究,具有如进化生态学、生物社会学、生物文化科学、生物社会科学、人类生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社会生态学、进化生物人类学、人类行为研究等分支领域。^③ 行为生态学在源头上与生态人类学和以行动者为基础(actor-based)的人类学研究相关,在资源分配等方面显示出政治经济意义,行为生态学的后续发展影响到政治学、法学,也影响到政治生态学。

政治生态学在批判中产生,在反思中发展。在全球环境问题,如垃圾、转基因、灾害、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中,政治生态学展示出了其特有生机和活力。政治生态学与其他理论的研究取向相结合,促动了西方生态/环境人类学的发展与更新。

三、政治生态学的全球环境变迁研究

政治生态学重点研究当代社会中的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全球环境变迁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随着全球化过程和逆全球化思想的出现,政治生态学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城市、乡村、草原、海洋等研究领域,在水资源、畜牧业集中养殖、转基因、垃圾贸易、风险、灾害和气候变化等全球当代环境问题之中,甚至在国土安全方面,都有政治生态学的“身影”。在当代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耦合关系研究中,政治生态学也有突出表现。

城市政治生态学为城市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城市生态行动开辟了新途径。大多数政治生态学研究集中在农村或其他边缘地区和社会世界,他们呼吁要更仔细地关注制度和国家权力中心如何影响农村权力关系。但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关于社会机构的精确配置的争论激发了一群以民族志为基础的城市政治生态学者,他们将传统的政治生态知识应用到城市的实地考察之中。^④ 城市人口的集中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新的景观,这些景观标志着人类认知的进步。城市生态的核心是污染问题,城市污染与农村地区资源被掠夺本质上没有区别。发达国家城市是世界上许多有毒废物的源头,这些毒废物向不发达地区的输送成为环境正义所要追索的焦点问题之一。^⑤ 垃圾的生产、处理和交易方式成为政治生态学

① 参见 A. J. Faas, "Disaster Vulnerabilit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Annals of Anthropological Practice*, Vol. 40, No. 1, 2016.

② 参见 Aletta Biersack, "Introduction: From the 'New Ecology' to the New Ecolog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1, No. 1, 1999.

③ 参见 Lee Cronk, "Human Behavioral Ec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0, 1991.

④ 参见 Anne Rademacher,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44, 2015.

⑤ 参见 Nik Heynen, Maria Kaika, and Eric Swyngedouw,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Politicizing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Natures," in Nik Heynen, Maria Kaika, and Eric Swyngedouw eds., *In the Nature of Citie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19.

的重要研究主题。摩尔(Sarah Moore)认为,垃圾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垃圾是什么,在哪里,如何处理都是政治问题。首先,垃圾的主要生产者是国家富人,其中尤以美国最为突出;其次,垃圾的流动与全球资本流动、非均衡发展过程和边缘化联系在一起,因此,垃圾的处理和贸易方式,最终流向直接指向了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贫民窟地区,那里的人民与垃圾一起生活;最后,垃圾对整个生态环境和全人类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垃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了污染物渗入特定社区的含水层,径流渗入特定社区的土壤,蟑螂和老鼠聚集在垃圾场,垃圾焚烧不仅造成了当地的空气质量问题,还导致了全球变暖。^① 环境变迁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使其中的一些人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损害了生态环境,那些获得经济利益的人所造成的生态后果由另一些人来买单。这在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发达国家高碳排放和工业污染由发展中国家买单,发达国家的垃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由于缺乏资金不得不进口和堆放发达国家的垃圾,以换取外汇。由此,垃圾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问题,它是一个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相关的政治生态学的问题。

政治生态学家贝克尔(Karen Bakker)对水权和水私有化进行过深入的政治生态学研究。他认为,水私有化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案例指明了一个新的水文化和水权视野。水私有化有支持者和反对者两种观点:支持者是政府试图将水资源定义为一种商品,并建立私人水源和水市场;反对者认为,供水系统是政府营运的,应得到适当的支持,使之有效、公平,目的是让人民获得廉价的水资源。水私有化的争论有更深入的水权辩论内涵,世界水危机如同更普遍的环境问题一样,是一场以经济和政治权力问题为核心的再分配斗争,而水权私有化的政治生态学研究,让人们更加明确了国家、市场、社区与水环境之间的关系。^② 水权和水私有化以及水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与环境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一些政治生态学家研究牲畜集中养殖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艾米尔(Jody Emel)和尼欧(Harvey Neo)认为,集中养殖牲畜和禽类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畜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肉食产量,但是,集中养殖特别是大型养殖场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和对健康的影响没有得到有效重视。广泛密集的禽畜废物生产导致了水质问题。动物粪便通过地表径流,渗入土壤和地下水,直接排放和溢出等方式危害水质。生产过程的集约化程度越高,所排放的化学品可能就越为有害。^③ 非亚拉(N. Fiala)的研究证实,畜牧业每年产生46—71亿吨温室气体,相当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5%—24%。^④ 斯尼林格(S. Sneeringer)的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牲畜数量增加一倍,婴儿死亡率就会增加7.4%。土地中施用动物粪会导致土壤中重金属和磷的积累,土壤成为耐药细菌的蓄水池。^⑤ 事实说明,畜牧业的集中养殖所带来的

① 参见 Sarah Moore, "Global Garbage: Waste, Trash Trading, and Local Garbage Politics," in Peet, Richard, Paul Robbins, and Michael Watts eds., *Global Political Ec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133—144.

② 参见 Karen Bakker, "Commons Versus Commodities: Political Ecologies of Water Privatization," in Richard Peet, Paul Robbins, and Michael Watts eds., *Global Political Ecology*, pp. 347—370.

③ 参见 Jody Emel and Harvey Neo, "Killing for Profit: Global Livestock Industries and Their Social-Ecological Implications," in Richard Peet, Paul Robbins, and Michael Watts eds., *Global Political Ecology*, pp. 67—83.

④ 参见 N. Fiala, "Meeting the Demand: An Estimation of Potenti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Meat Produc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67, No. 3, 2008.

⑤ 参见 S. Sneeringer, "Does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 Pollution Hurt Public Health? A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Health Externalities Identified by Geographic Shifts in Livestock Produ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91, No. 1, 2009.

环境危害是一个政治生态学问题。对畜牧业集中养殖的环境影响评估在很多国家并未受到重视。基于经济发展、肉食供给等原因,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畜牧业养殖。

转基因也是政治生态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者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上种植转基因种子的总面积一直在稳步增长。到2007年,全世界22个国家约7%的土地种植了转基因种子,这一比例还在继续上升。转基因农业的迅速推广是环境保护巨大失败的标志。^①转基因农业不仅将给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还加剧了农业霸权的形成,造成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政治生态学对于风险、灾害和气候变化的研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灾害人类学家也受到政治生态学家的影响,认为灾害与人类的活动,特别是政治经济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霍夫曼(S. Hoffman)和奥利佛一史密斯(A. Oliver-Smith)的研究就指出,政治生态学不把灾害(如飓风、地震、洪水等)看成是极端的地理事件,而是看作正在经历中的压在自然环境之上的社会秩序功能。危机导致灾害,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技术灾害,都直接源于与环境有关的人类活动,以及人类对于环境的过分干扰。^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社会,特别是一些商业集团在灾害应急和风险中得到资本利益,学术界将这种获利方式称之为“灾害资本主义”。灾害资本主义是政治生态学中的重要分析框架。灾害资本主义的概念由维权记者克莱恩(Naomi Klein)于2005年首先提出,^③国家和跨国政府机构将灾害(自然和人为灾害)作为一种获得私利的工具来使用。^④灾害资本主义体现在灾害发生的特殊时期,包括应急、救援、恢复重建等,因为该时期存在大规模的非招标合同,能够获得商业暴利机会。除了应急和急救阶段外,风险和气候变化也具有灾害资本主义的意义。例如,气候变化导致北极地区的冰层融化,冰雪融化对当地原住民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于那些石油大亨们来说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冰雪融化带来开采的理由和利润机会。^⑤如此不难解释灾害和气候变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政治生态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贯穿于风险、灾害和气候变化发生的全过程之中。

当代社会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耦合,它直接导致了人类纪(anthropocene)的产生。“人类纪”由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克鲁岑(Paul Crutzen)和地质学家斯托默(Eugene Stoermer)于2000年首次提出。人类纪被认为是当代地球系统进入了新的纪元,标志着全新世(Holocene)时代的结束,一个以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并驾齐驱,自然力量与人类干扰相互交错的时代已经到来。^⑥人类纪概念表示人类对于地球影响的新的能动性。^⑦

① 参见 Joel Wainwright and Kristin L. Mercer, “Transnational Transgenes: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Maize in Mexico,” in Richard Peet, Paul Robbins, and Michael Watts eds., *Global Political Ecology*, pp. 412–430.

② 参见 Susanna M. Hoffman and Anthony Oliver-Smith, “Anthropology and the Angry Earth: An Overview,” in Anthony Oliver-Smith and Susanna M. Hoffman eds., *The Angry Earth: 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1–16.

③ 参见 Naomi Klein,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Nation Magazine*, Vol. 280, 2005.

④ 参见 Mark Schuller and Julie Maldonado, “Disaster Capitalism,” *Annals of Anthropological Practice*, Vol. 40, No. 1, 2016.

⑤ 参见 Hans A. Baer and Merrill Singer, *The Anthropology of Climate Change: An Integrated Crit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90–91.

⑥ 参见 Paul J. Crutzen and Eugene F. Stoermer, “The Anthropocene,” *IGBP Newsletter*, Vol. 41, 2000.

⑦ 参见 Jan Zalasiewicz, Mark Williams, Will Steffen, and Paul Crutzen, “The New World of the Anthropoce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44, No. 7, 2010.

人类纪时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暗藏着一个基本命题,即人类居住的星球——地球,它的未来终结者可能是人类自身,或者说是人类力量与自然力量、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耦合决定了地球的未来。人类纪的概念在自然科学界得到广泛认同的同时,也得到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界的认同,这也说明人类纪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①从人类纪概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类居住的星球与当今政治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事实上,人类对于地球的驱动力源于与政治经济有关的各种活动。

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还促进了人类学家对于环境正义的讨论。“环境正义”一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标志着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危害和工业有害废物沉积的不平等的社会地理分布。^②环境正义既是一种社会运动,又是一种分析形式。它所依据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丧失权力的社区,特别是少数族裔社区和城市穷人,不成比例地处于技术危险之中(例如铅冶炼厂、垃圾焚烧厂、发电厂和其他可能致命的接触源)。^③环境正义的理论框架直接指向了人类与人类、人类与物种之间的公平分配原则和道德困境,包括环境负担如污染等不公平地分配给少数民族和脆弱群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环境风险方面的不平等。^④

所有这些说明,政治生态学对当代环境问题的研究,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层次环境认知的重要标志。包括风险、灾害、气候变化、人类纪等在内的环境问题,都会涉及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环境变迁实质上就是政治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顾同盟国反对退出气候变化协议就充分说明政治经济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利害关系。

四、后结构主义的政治生态学

政治生态学对生态问题的持续兴趣促使人们不断探索,政治生态学由此走向了更深的层次,出现了后结构主义的政治生态学。作为政治生态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取向,后结构主义的政治生态学具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自然是由社会构建的。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是艾斯格巴(A. Escobar)、德斯科拉(P. Descola)等人。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强调自然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在这个问题上,艾斯格巴有重要的论述,他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将自然和文化交织在一起,认为人们观察到的自然是社会和文化构建的,自然因此被社会化,这是政治生态学的反本质主义原则,被称为“新政治生态学”。^⑤所谓观察到的自然,就是对周围世界的文化性观察,在自然环境的认知过程中赋予其

^① 参见 Donna Haraway, Noboru Ishikawa, Scott F. Gilbert, Kenneth Olwig, Anna L. Tsing and Nils Bubandt, “Anthropologists Are Talking About the Anthropocene,” *Ethnos*, Vol. 83, No. 3, 2016。

^② 参见 Merrill Singer and Jacqueline M. Evans, “Water Wary: Understandings and Concerns about Water and Health among the Rural Poor of Louisiana,” in Helen Kopnina and Eleanor Shoreman-Ouimet eds.,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Future Direc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188—204。

^③ 参见 Paul Robbins, *Political Ecolog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4, p. 74。

^④ 参见 Helen Kopnina and Eleanor Shoreman-Ouimet,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of Today and Tomorrow,” in Helen Kopnina and Eleanor Shoreman-Ouimet eds.,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Future Directions*, pp. 1—22。

^⑤ 参见 Arturo Escobar, “After Nature: Steps to an Antiessentialist Political Ec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0, No. 1, 1999。

文化意义。艾斯格巴核心观点就是自然由社会构建,自然不仅被定义为一个外部的、可开发的领域,还是一个资本化的过程,即自然和社会都是资本的一部分。^① 自然资本的开发在现代社会中随处可见,如大规模的商业林和热带雨林开发,植物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商业开发,以及植物的药物利用和开发等。将自然、资本和社会文化统一起来,展示了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中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密切关系。

其次,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强调生态系统中物与物之间的广泛关系。动物、植物和其他实体作为生态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均受到文化规则的约束。人类的能动性和其他物种的能动性都是构成生态系统的一个方面。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惠关系设想为具有平等地位的伙伴或实体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为在自然主义宇宙论中,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点:它们要么被认为属于相互联系的群体,要么属于具有局限性的独立领域。^②

最后,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重视传统社会与可持续性的关系。此与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争论相关联。霍恩伯格(Alf Hornborg)认为,在传统社会能否给人类社会提供可持续性生活的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肯定的观点,即能够告知人类社会可以持续性地生活,霍恩伯格把这种观点命名为“语境主义”(contextualist)。另一种是否定的观点,即不能够告知人类社会可以持续性地生活,霍恩伯格把这种观点命名为“现代主义”(modernist)。他认为前者就是一元论坚持者,后者是二元论坚持者,一元论和语境主义的理论基础具有规范意义,而二元论和现代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暴露出局限性。^③

从上述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的有关见解来看,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如同令人迷乱的后现代思潮一样,有关认识和看法也处于杂糅纷乱状态,有待进一步厘清和完善。尽管如此,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通过对现代社会环境问题的关注,将生态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推进了生态/环境人类学的发展。

五、政治生态学受到的批评与政治生态学的未来趋势及意义

政治生态学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人类学批判,特别是对文化生态学的反思。政治生态学在批判他人的过程中也受到其他理论家的批判,不同的争论声音使得政治生态学在批判中得到不断发展和进步。人类学家维伊达(Andrew P. Vayda)和沃特斯(Bradley Walters)对政治生态学中的“唯政治经济论”进行了尖锐批评。他们把1999年发表的文章直接命名为《反政治生态学》(Against Political Ecology),认为在环境变迁过程中的人类影响,以及人与环境互动关系中,强调政治因素是很重要的,但很多政治生态学家却超越了这种关注,认为政治影响,特别是外来的政治经济影响高于其他一切影响。因此,一些人不是在讨论环境变迁的政

^① 参见 Arturo Escobar, “Constructing Nature: Elements for a Poststructural Political Ecology,” in Richard Peet and Michael Watts eds., *Liberation Ecologie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v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46—68.

^② 参见 Philippe Descola, “Constructing Natures: Symbolic Ecology and Social Practice,” in Philippe Descola and Gisli Palssonson eds., *Nature and Societ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80—102.

^③ 参见 Alf Hornborg, “Ecology as Semiotics: Outlines of a Contextualist Paradigm for Human Ecology,” in Philippe Descola and Gisli Palssonson eds., *Nature and Societ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45—62.

治因素,而是变成了自然资源政策研究或者政治人类学研究。^①其他的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认为应该“真实地讲述环境变化”,回归到对环境退化的结构主义解释上来。^②

当然,政治生态学家不会无视维伊达等人的批评,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认为维伊达等人的批评有点夸张。虽然有的政治生态学家不强调生态,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生态学中没有生态”。环境变化的研究传统(植根于古老的文化生态学)在今天的政治生态学中依然存在。一些政治生态学家,如艾斯格巴等,已经走向了后结构主义范式的政治生态学,将注意力转向地方层面的环境研究——心理运动、话语和象征政治,以及权力、知识和实践的制度联系。但是,随着“政治生态学”对政治经济的关注,在一些批评家看来,生态的作用的确在日益边缘化。^③

对于政治生态学的另一个批判聚焦在研究方法方面。最为突出的批评者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和环境科学教授莫兰(E. Moran)。莫兰认为,政治生态学的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与物理和生物科学相距甚远,政治生态学更关心文化和政治批评,很少将大量环境数据作为分析的一部分提出。因此,该研究取向在政治方面令人振奋,但在环境方面不具有实质意义。莫兰还对政治生态学的积极支持者即人类学家格戎(Gezon)对马达加斯加北部土地使用冲突的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格戎虽然研究了当地人如何在政治上参与资源争夺,但很少提出与资源争夺有关的环境数据。^④

政治生态学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包括了政治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和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强调社会认同(如女性认同)、权力、景观之间的关系和交汇,在解决规模、权利和责任、边缘化和脆弱性等问题上尤其如此。^⑤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在强调政治经济的同时,还从女性的角度看待生态问题,对男权社会的生态学研究进行批评。^⑥另外,政治生态学向着更为宽广的领域扩展,更加集中于现实问题,面临更多的争论,涉及更多的方法,得到更多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是政治生态学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向。从目前来看,政治生态学不仅关注当代政治生态问题,还关注历史上的政治生态问题;不仅关注城市生态、农村生态、海洋生态、草原生态问题,还关注城市贫困、国土安全问题;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生态环境变迁问题,还关注当代全球生态环境变迁问题。此外,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相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卫星遥感技术在研究中的应用,表明政治生态学将步入跨学科发展的时代。在莫兰看来,一个村庄的研究不能代表更大范围的人口问题,数据归纳也受到阻碍。今后的环境变迁问题是复杂的,没有一种单

① 参见 Andrew P. Vayda and Bradley Walters, “Against Political Ecology,” *Human Ecology*, Vol. 27, No. 1, 1999.

② 参见 Henry Bernstein and Philip Woodhouse, “Telling Environmental Change Like It Is? Reflections on a Study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1, No. 2, 2011.

③ 参见 P. A. Walker, “Political Ecology: Where Is the Ecolog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9, No. 1, 2005.

④ 参见 Emilio F. Moran, *Environmental Social Science: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and Sustainabilit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0, p. 45.

⑤ 参见 Anne-Marie S. Hanson and Stephanie Buechler, “Introduction: Towards a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of Women, Global Change, and Vulnerable Waterscape,” in Stephanie Buechler and Anne-Marie S. Hanson eds., *A Political Ecology of Women, Water,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1—16.

⑥ 参见 Yvonne A. Braun, “Interrogating Large-scale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in Lesotho: Bridging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Intersectionality,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Frameworks,” in Stephanie Buechler and Anne-Marie S. Hanson eds., *A Political Ecology of Women, Water,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pp. 19—37.

一的办法能够应对未来的复杂问题。^① 政治生态学研究,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可缺少的。政治生态学还发展到了考古学领域, 莫哈特(Christopher T. Morehart)等人指出, 考古学家需要政治生态学, 而更为重要的是, 政治生态学家也需要考古学, 因为考古学家根据景观、地点、制度和事物的物质性而进行的史前重建工作是政治生态学研究的有效基础。没有这样的研究框架、方法和分析尺度作为基础, 政治生态学家在韧性、可持续性、边缘化和退化等相关主题上的发言权威将面临很大的挑战。^②

作为当代生态/环境人类学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取向之一, 政治生态学在批判中产生, 在发展中受到批判, 在全球新的环境危机中不断解构别人, 也在自我解构, 在实践共同体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当代各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政治生态学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的环境问题, 不仅是一个发展的问题, 还与政治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建立在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的基础之上, 实行最为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生态修复制度等。毋庸置疑, 这些制度与政治经济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能够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也能够为政治生态学理论提供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 刘海涛〕

^① 参见 Emilio F. Moran,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as One of Spatial Sciences,” in Helen Kopnina and Eleanor Shoreman-Ouimet eds.,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Toda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97–117.

^② 参见 Christopher T. Morehart, John K. Millhauser, and Santiago Juarez, “Archaeologies of Political Ecology: Genealogies, Problems, and Orientations,” *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29, No. 1, 2018.

Jurchens in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the Ming dynasty; Wild Jurchens; Haixi Jurchens; wei-suo; imperial edicts.

Clan Organizations and Mongolian Eight Banners Niru: Taking the Manchu Temgetu Bith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s an Example N. Hasibagen (104)

Abstract: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Manchu archives of 11 pieces of Mongolian Eight Banners Niru's (organization or the leader of Eight Banner) temgetu bithe (Ch. yin Zhou 印轴, literally, printed scroll) and mukun (clan) leader's temgetu bithe have not been used by researchers. Through these archives, as the resources for resolving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s and personnel composition of the Mongolian Eight Banners, some details of the mukun organizations in the Mongolian Eight Banners Niru in the Qing Dynasty could be discovered.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four temgetu bith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n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mpilation, support, inheritance of Niru and garrison of the Mongolian Eight Banners. In general, although the Qing court during the Yongzheng 雍正 and Qianlong 乾隆 periods, carried out a large-scale reform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to strengthen centralization, within the Niru which as the grassroots of the Eight Banners, the clan organizations which continued from the tribal era were still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Keywords: clan organizations; Mongolian Eight Banners Niru; Niru temgetu bithe; mukun leader's temgetu bithe.

A Review on Political Ecology Research Li Yongxiang (118)

Abstract: Political ecology derived from the 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cultural ecology.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 political ecolog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Political ecology covers the topics of land use, forest management, livelihood change, water rights, animal husbandry,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 and homeland security. With human's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ognitive research methods, political ecology has stepped into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post-structuralism.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from cultural ecology to post-structuralism ec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o the study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such as disasters, climate change, anthropocene; and it is also usefu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Keywords: political ecology; cultural ecology; post-structuralism anthropology; environmental change.

Summary of the 10th National Symposium about Ethnic Theory and Policy Teaching and the 14th 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by Graduate Students Who Study Ethnic Theory Dong Qiang, Zhang Youjia and Wangyao (129)

A Summary of the Annu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in 2018 Luo Ting (132)

Summary of the 12th China Southwest Forum of Ethno-National Studies: Common Homeland, Rural 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ang Meiyang and Wang Jue (134)

Summary of Colloquium on the Qing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Xiao Chaoyu (136)